

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曹玮◎编著

周原甲骨文



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

周 原 甲 骨 文

曹 玮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原甲骨文 / 曹玮编著. —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2
(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
ISBN 7-5062-5665-7

I. 周... II. 曹... III. 甲骨文 IV .K877.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2563 号

周 原 甲 骨 文

编 著 者: 曹 玮
责任编辑: 纪 谊
版式设计: 郑巍然
装帧设计: 于天水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14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2-5665-7/K · 5

定价: 2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 Inscribed Oracle Bones at Zhouyuan

Abstract

The author reviews the already obtained research results since the discovery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s at Zhouyuan and affirms their achievements in the preface. He points out that owing t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n some key issues such as “Wang yu Zhou fang bo 王与周方伯”, “ce zhou fang bo 昝周方伯” and “zong de wei zhi 宗的位置”, scholars had proposed three views on the owners of this batch of oracle bones, they are “Shang people view”, “Zhou people view” and “divination scripts inscribed by Shang people and records of events inscribed by Zhou people view”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he also puts forward his view on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this research field and introduces the present preservation condition and location of Zhouyuan’s oracle bones.

The main body of the report shows the enlarged photos of Zhouyuan’s oracle bones and demonstrates their original physiognomy. Through photos, scholars can identify characters from the oracle bones and as a result advance the study into a new level. Meanwhile, the author reexamines the three hundred pieces of oracle bones and proposes that fifty-eight pieces such as H11:62 and H11:79 are not inscribed by man power; another sixteen pieces including H11:149 and H11:166 are carved with border marks and insignias; consequently they do not belong to the research scope. All the others are research priority. In the reference decipherment, the author positively affirms the formerly obtained results and corrects some mistakes due to illegible scripts.

For ease of reference, the present volume contains two tables: *Look-up Table of Facsimiles and Records o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t Zhouyuan* and *Look-up Table of Rubbings and Decipherments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t Zhouyuan*, which are formed on the bases of four treatises. The four treatises are *Shan-xi qi-shan feng-chu cun xi-zhou jia-gu-wen gai-lun* (《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Zhou’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Found in Fengchu Village, Qishan, Shanxi* by Chen Quanfang), *Xi-zhou jia-gu tan-lun* (《西周甲骨探论》 *A Study of Western Zhou’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by Wang Yuxin), *Zhou-yuan jia-gu-wen zong-shu* (《周原甲骨文综述》 *Summary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f Zhouyuan* by Xu Xitai), and *Zhou-yuan jia-gu yan-jiu* (《周原甲骨研究》 *O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f Zhouyuan* by Zhu Qixiang). The author also makes a catalogue index of the already published papers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Zhouyuan’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任	李学勤			
副 主 任	仇士华	甘师俊	李伯谦	席泽宗
编辑委员	马承源	刘次沅	安金槐	朱凤瀚
	朱学文	纪 谊	辛德勇	李 峰
	严文明	张长寿	张培瑜	张晶义
	邹 衡	陈久金	陈铁梅	俞伟超
	原思训	殷玮璋	郭之虞	彭 林
	裘锡圭	雷玉清		
执行编委	刘次沅	朱凤瀚	朱学文	纪 谊
	张晶义	殷玮璋		



出版说明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第九个五年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之一。

在独立起源的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历五千年沧桑巨变而从未中断的，唯有中华文明。不无遗憾的是，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由兴起走向昌盛的时期，而我国古史的确切年代，只能上溯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始年——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历史纪年，或彼此歧异，或多阙失，难以考索。自西汉末年的刘歆起，两千多年来许多中外学者试图解决这一学术悬案。由于三代年代学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需要进行研究的问题很多，使得任何个人的力量都难以取得突破。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要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制定夏、商、周这一历史时期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根据各历史阶段的研究条件的差异，提出以下具体目标：

- 一、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 二、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 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 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为了达到以上目标，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兼用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项目分设“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夏代年代学的研究”、“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商后期年代学的研究”、“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14}C 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等9个课题，下设44个专题。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共200余位，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等诸多学科。

自1996年5月启动以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各项研究进展顺利，预定的各项目标已基本达到：建立了夏商周三代年代框架；对商王武丁至帝辛(纣)诸王、西周武王至厉王各世，给出了年代，由此而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在本世纪组织的第一个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重大科研项目，自启动之日起，备受社会各界和海外人士的关注。为使各界人士能全面了解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情况，给后人留下一份完整的三代年代学研究的资料，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它包括以下三个系列：

一、研究报告 收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报告(有简本、繁本两种)，和各课题、专题的结题报告。总报告是在对全部课题的成果进行总结和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项目和整体成果的集中表述。课题和专题的结题报告，旨在反映它们在实施项目的目标时，各自承担的任务、研究过程及完成情况。

二、考古报告 公布夏商周时期若干遗址的发掘情况，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建立夏商周年代框架所依据的考古学原始素材及发现与研究的过程。

三、研究文集 收录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对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对相关内容所作的专题研究、札记辑录；对天象资料所作的分析与计算，以及项目实施期间为进行科学探索组织学术活动的实录等等，旨在反映项目启动以来各学科围绕三代年代，从不同角度开展探索与研究的情况。

这套《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是这四年间进行多学科合作、联合攻关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由于在多学科合作中，各学科用不同手段研究同一年代时能得到一致或十分接近的结论，从而确保了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三代年代框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但它还不是三代年代学研究的终极目标，而是三代年代学研究步入新阶段的标志。我们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出土，随着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到年代学研究中来，未来的三代年代学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加接近真理的结论。

我们殷切希望得到国内外读者的批评指正。

《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编委会

2000年10月15日



前 言

1977年春天，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建筑遗址西厢房的11号灰坑和31号灰坑发现甲骨一万七千余片。这个空前规模的发现，为“文革”后刚刚复苏了的考古学、历史学、甲骨学等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时间众多学者围绕着这批甲骨，对其族属、背景、内容、钻凿形制、行款特点、分期断代，以及西周甲骨和商代甲骨的区别、商周之际时的商周关系等新老学术课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学术上的“周原甲骨热”一直持续到90年代，至今已有四本专著和八十余篇论文（大陆以内）面世，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

一、研究现状

回顾周原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有一个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

1978年11月，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一届年会在长春召开。徐锡台先生在提交的《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的论文中，对周原甲骨文中的“成唐”、“大甲”、“毕公”、“大”四个人名，“大保”、“师”两个官名，“衣”、“虫白”、“楚”、“蜀”、“巢”、“鬼”、“戾”、“微”、“邛”九个国名，“蒿”、“亓”、“帛”、“密”、“龟”等地名，“洛”、“肅”、“川”等河名进行了考释，同时，得出了卜辞中的“王”即商王、周原卜辞反映了商周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结论。徐先生的这篇论文拉开了周原甲骨研究的序幕。会上，徐先生还提交了《探讨周原甲骨文中有关周初的历法问题》的论文，与会学者对周原甲骨所涉及到的纪年、闰月和周初月相进行了讨论。

1979年4月，在西安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上，徐锡台与楼宇栋二位先生提交了《西周卦画探源》的论文。该论文是受张政烺先生论点的启示，对周原甲骨的数字进行了探讨，得出周原卜辞中的数字是重卦、重卦是西周早期的卦形、此时阴阳并未出现等几个结论。

1979年在《文物》第10期上，发表了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的简报，对周原出土的一百九十多片甲骨文中的H11：1、4、20等30片甲骨进行了报道。简报将周原甲骨分为武王灭商前、灭商后二期。

1979年12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在广州召开。李学勤、王宇信二位先生提交的《周原卜辞选释》的论文中，考释了H11：1、84、3、132、83五片甲骨，将其与殷墟甲骨



相比较,得出周原卜辞的“王”为商王帝辛、“周方伯”是周文王、卜辞是在其他地方占卜后移到周原等几个结论,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成为研究的焦点。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学者们围绕着周原卜辞的族属、来源、占卜的地点、王、周方伯等几个问题,纷纷著文讨论,逐渐形成了周原甲骨研究的高潮。

1980年徐锡台先生于《考古与文物》第2期上,发表了《周原出土甲骨的字型与孔型》一文,文中将字型分为大中小三型,对甲骨的孔型、孔的排列作了介绍,并着重强调了与商代甲骨不同之处。这一点成为徐先生周原甲骨为周人之物论点的论据之一。

同年9月,在成都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徐锡台先生提交了《周原卜辞十篇选释及断代》一文,田宜超先生提交了《“王曰我枚单冢勿卜”解》一文,两篇文章均登载在《古文字研究》第六辑。

周原甲骨文中记载的人物,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1981年第1期的《考古与文物》发表了顾铁符先生的文章《周原甲骨文“楚子来告”引证》,就H11:83甲骨文的“楚子”作了考证。顾先生认为楚子是鬻熊,于商末弃暗投明来到岐周,受到周文王的欢迎,鬻熊占卜,刻于卜甲上;文中对鬻熊的学术地位和“鬻熊居丹阳”的丹阳也进行了论证。

陕西周原考古队在《文物》1981年第9期刊登了《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发表了于齐家村东壕内发现的完整龟腹甲H3[2]:1(23字),卜骨NH1[3]:1(8字),卜骨TI[4]:1(21字),卜骨采集:108(24字),卜骨采集:94(12字),卜甲H3[2]:2、4、5(无字),卜骨H3[2]:6(无字)等二十余片甲骨的材料,使西周甲骨学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尤其是H3[2]:1完整甲骨的发表,不仅对认识西周甲骨文的行款、卦画和内容有所帮助,而且丰富了对西周甲骨钻凿和修整方面的知识。根据发表的这批材料,李学勤先生在同期杂志上发表了《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一文,围绕着“较完整的西周甲骨”、“商周甲骨的对比”、“凤雏甲骨的年代”“卜与筮的关系”等论题进行讨论,指出了周甲骨与商甲骨的不同之处:卜辞顺着兆的走向即朝着“千里路”横向纵行、贞问没有正反对贞、胛骨以白部向下为正、肩胛骨的位置加钻灼兆、西周甲骨的修治简陋、卜甲上排列规则而密集的方凿、卜辞简略的格式等,并得出“商周的甲骨有许多根本性的差别,应该认为是两种不同传统的卜法。西周甲骨不是殷墟甲骨的直接延续。”就其时代而言,“我们认为这些是周人替商王占卜的龟甲,其年代可定为周文王时,是这坑卜辞里面最早的。”周原甲骨的年代当自文王至康昭时期。

1982年,《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发表了王玉哲先生的论文《陕西周原所出甲骨文来源的试探》。王先生认为周原甲骨不是周族的而是商王室的,甲骨是商末由“掌管占卜的卜人投奔周人时,携带过去的”。其论据是:商末时商周两族矛盾尖锐,从祭祀传统上,周人不会祭祀商王;“𠄎周方伯”意为把周方伯作为牺牲,祭祀商王祈求福祐;周原不是龟甲产地,也不会有东南沿海的部落向其进贡。

1982年第3期的《考古与文物》发表了周原考古队、周原岐山文管所撰写的发掘简报《岐山凤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公布了两次出土而尚未发表的带字甲骨78片。



1982年5月,《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刊登了有关周原甲骨的三篇文章:徐中舒先生的《周原甲骨初论》、缪文远先生的《周原甲骨所见诸方国考略》、陈全方先生的《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陈先生将两次发现的周原甲骨全部公布于世。H11和H31两个灰坑共出土甲骨17275片,其中卜甲16371(H31出土49片),卜骨678片(H31出土258片),有字卜甲292片(H31出土10片)。陈先生把有字甲骨分卜祭、卜告、卜年、卜出入、卜田猎、地名、人名、官名、月相、杂卜十类作了考释。徐先生的论文论证了周文化的两个来源——姬姓族来源于东部的光社文化,姜姓族来源于西部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并结合周原甲骨文、历史文献和铜器铭文论证了文王时代的殷周关系,指出“周原甲骨凡称王的卜辞,皆指文王而言”,当时殷周关系稳定,周原甲骨文应出于殷人之手。缪先生在文章里论证了殷周关系和蜀、巢、楚、微、鬼、虫六个方国。

1982年12月,陕西省考古学会暨第一届年会在西安召开。作君魁先生著文《试论“周方伯”》,与范毓周先生商榷,文中认为周原卜辞中的“王”和“周方伯”为同一人,即周文王。论文发表在《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上。

1983年《考古与文物丛刊》第2号《古文字论集》(一)刊登了两篇有关周原甲骨研究的文章。陈全方先生在《周原甲骨所见国名补释》一文中对衣、微、楚、密须、巢、崇、胡、毕等国名进行了考释。徐锡台先生在《周原出土卜辞试释》一文中,对292片甲骨中的21片甲骨进行了考证。

1983年10月,中国先秦史学会在宝鸡和洛阳召开。会上陈全方先生在《周原新出土卜甲研究》一文中考证了周原卜辞中的河山、地名、人物、职官、动物、计时法、八卦符号及我国古代的数学等问题。徐锡台先生的《周原齐家村出土西周卜辞浅释》一文,以齐家村出土的西周甲骨为基础材料进行了探讨。两篇文章收在会议论文集《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中。

1984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宇信先生的《西周甲骨探论》一书。这是关于西周甲骨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全书16万字,分七篇:第一篇简要地叙述了西周甲骨的发现与研究;第二篇对山西洪赵坊堆村、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昌平白浮村、陕西岐山凤雏村、陕西扶风齐家村等地出土的西周甲骨进行了汇释;第三篇为作者对西周甲骨的研究;第四篇通过对“王”字的分析,并结合史籍及字型书体对西周甲骨进行分期(文王时期有23片,其余都为武、成、康时期之物);第五篇简论了西周甲骨的价值;第六篇收集了1982年5月以前所公布的西周甲骨摹本301片;附录中收录了西周甲骨文中的重要文字索引和论著简目。王先生的著作是对前一阶段西周甲骨研究的总结,同时“又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指明了方向”(李学勤序言)。

1984年《考古与文物》第5期发表了高明先生的文章《略论周原甲骨文的族属》。高先生从分析殷周甲骨的特点与区别、殷周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了周原甲骨卜辞内容及其背景,得出周原甲骨卜辞是周人卜辞,其中一部分是周文王被囚居殷时所占卜的卜辞,之后带回周原的论点。



1984年10月，徐锡台先生从周原甲骨卜辞中选出了H11：94、225、232、237、261、266、273，H31：3、4、5共十片进行了考释，写成《周原出土卜辞选释》一文，发表在《出土文献研究》上。

研究周原卜辞记载的方国“蜀”与“楚子”有两篇文章。四川大学林向先生著文《周原卜辞中的“蜀”》，从周原甲骨文“蜀”字的断代和字型分析入手，涉及到字的原意，最后，运用考古学材料论证了商周之蜀，是氏族的一支——蚕丛氏在川西北岷江上游的山地建国，否定了蜀在山东境内的说法。文章刊登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唐嘉弘先生在《文物》1985年第7期发表了《试谈周王和楚君的关系》一文，否定了商周时期存在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的说法，认为周原卜辞中的“楚子”是周人养子部落的首领或酋豪。

1984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在西安召开。徐锡台先生宣读了《试释周原卜辞中的“𠄎”字》一文，认为周原甲骨中的“𠄎”当释成“西”字。连劭名先生的《读周原出土甲骨刻辞》一文，结合古代文献，并与殷墟甲骨文相比较，阐释了周原甲骨文中的彝、昭、中、正、省、尚、大作、见工、立、克事、亡左、永终等字词的涵义。

1986年第1期的《人文杂志》上发表了李学勤先生的《续论西周甲骨》一文。这是李先生有关西周甲骨的第三篇文章。在文章中，李先生从形制、辞例、“𠄎”字的释读和对性质与年代的论述等几个方面，全面地重新审视了周原甲骨卜辞，对过去自己的研究和论述作了补充，同时对认为不确切和不当的地方作了修正。李先生指出西周甲骨虽然也用龟甲，但在龟甲的整治、钻凿和胛骨的方向等方面与殷墟甲骨有明显不同；辞例上没有兆辞，却以小字卜辞守兆，或在兆旁划“[”“-”等形线作为标识，以及文字的方向、前辞中用“彝”字等都是殷墟甲骨所不见的。最后得出周原甲骨“为周的卜辞”的结论。

1986年《考古与文物》第2期发表了孙斌来先生的文章《对两篇周原卜辞的释读》。孙先生从考证H11：1和H11：84两片甲骨卜辞入手，得出“彝文武帝乙宗”是“毁掉帝辛之父帝乙的宗庙”，“王”与“周方伯”都是指周文王的结论。

1986年王宇信先生发表了《西周甲骨述论》一文。文章的第二部分回顾了西周甲骨发现、认识和研究的历史，从殷墟四盘磨西地SP11发现的卜骨文辞与商甲骨不同想到殷墟外还有其他的甲骨文开始，到陕西郿县出土卜骨、河南洛阳东郊泰山庙出土方凿龟版、山西洪赵坊堆村发现刻辞甲骨、陕西长安张家坡发现有字甲骨等，对西周甲骨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作者以1956年和1986年为分界点，将这一认识过程分为三段：第一阶段是从不认识西周甲骨到认识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以出土、公布新材料，考释文字，探讨分期与特征为内容的；第三阶段是全面整理和利用西周甲骨研究周初历史的阶段。这个分期基本上反映了西周甲骨文发现、研究的过程。文章第三部分是从山西洪赵坊堆村、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昌平白浮村、陕西岐山凤雏村、陕西扶风齐家村等地出土的西周甲骨卜辞中选出了52片进行汇释。文章第四部分阐述了西周甲骨的特征及与殷卜辞的关系。王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初次接触西周甲骨和进行深层次研究的必读之物。



1987年《文物》第2期上刊登了罗西章、王均显二位先生的论文《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作为周原扶风地区西周甲骨的发掘者和发现者，罗、王二位先生结合地形和考古发现，就这一地区出土的六十余片甲骨中的有辞卜骨、有辞卜甲、无辞卜骨、无辞卜甲的整治特点，以及钻凿情况、文字记载分别进行了阐述和考释。

1987年《殷都学刊》登载了杨升南先生的文章《周原甲骨族属考辨》。杨先生首先分析了H11: 1、82、84、112四片争议比较多的甲骨卜辞，指出了这四片甲骨卜辞在某些辞例、某些用语和祭祀名称上具有殷人卜辞的特点，同时在某些辞例、某些用语、字迹风格和钻凿形态又强烈地呈现出周人的特征。由此断定“这几片甲骨的文辞是商人，它是商王帝辛为册封周方伯这一典礼中，所进行的一系列占卜的卜辞，受封的周人把帝辛的占卜，用周人的语言记录下来，镌刻在周人的甲骨上。……由于是记录的商王占卜事类，故辞例、用语、祭名、用牲等都保存了商人甲骨的一些特点。但因记录者是周人的占卜人员，所以不仅甲骨的形制、字体风格是纯系周人的，且其中还加入了周人的习惯用语，甲骨的格式与殷墟甲骨相比，也有了一些改变，其原因就在于此。”

1987年，在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的《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中，徐锡台先生著文《周原甲骨文族属及时代的探讨》，从甲骨的钻凿形式，灼、兆枝、刻辞部位，刻辞特征等阐明周原甲骨卜辞是周王室的产品，并从分析甲骨卜辞中的“王”字字型、甲骨卜辞的内容和同坑出土的其他器物入手，将周原甲骨分为二期：王季晚期至文王中期；文王晚期至周公摄政时期。作君魁先生对王玉哲先生提出来的周原甲骨“绝大多数是殷商末年商王室的遗物”的观点提出异议，撰文《周原甲骨来源辨》也登载在论文集上。

1987年，由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徐锡台先生多年潜心研究的专著《周原甲骨文综述》面世。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概述了周原的历史地理沿革和周原甲骨出土简况；第二章甲骨文考释是全书的中心部分；第三、四章是徐先生对周原甲骨多年研究的总结；第五章评述了周原甲骨的学术价值。最后附有周原甲骨字型对照表、检字笔画索引、参考文献、周原甲骨文论著目录及部分甲骨的图版。

1988年第2期的《人文杂志》刊登了李学勤先生的文章《周文王时期卜甲与商周文化关系》。文章从分析周原甲骨H11: 1、82、84、112四片卜辞的内容、辞例、钻凿等入手，得出结论：“（四片卜辞的内容）很可能就是命文王为西伯之事，因而周人卜官也参与其礼，并将所卜之龟携回周原”。

对周原出土甲骨的性质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H11: 1、82、84、112四片涉及祭祀商王的甲骨卜辞属周属商，学者的分歧较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了争论的焦点。1988年，王宇信先生连续发表了五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周原出土的庙祭甲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刊登的《周原出土商人庙祭甲骨来源刍议》一文，论证了商王朝的贞人来源于各个方国，上述四片甲骨出自周族入朝商王室的卜官之手。1988年第1期的《中国史研究》发表的《试论周原出土的商人庙祭甲骨》一文，首先从祭祀传统的习惯上，排除了周人祭祀商



王、在周原立商王庙或周文王在商王宗庙举行占卜的说法，并通过汇释四片甲骨卜辞进一步阐明卜辞为商人占卜之辞，最后得出四片甲骨是灭商后“作为战利品把商朝档案库中有关伐周的庙祭甲骨劫回周原”的结论。1988年第2期的《考古与文物》上发表了《周原出土庙祭甲骨商王考》一文，文中梳理了殷墟甲骨在征伐方国中祭祀殷先王的所有卜辞，判定四片甲骨的性质是帝乙、帝辛时与周发生战争的最好记录。1988年第3期的《人文杂志》发表了王先生的《周原甲骨刻辞行款的初步分析》，将周原甲骨刻辞行款分为四种类型，从而归纳出“周原出土较为典型的卜辞，据我们考证，毫无例外都是商王朝之物。而周原出土的记事文字，基本上都是周族或西周王朝物。刻辞行款和用途的不同，或许反映了殷周两大民族占卜方法和习俗的不同”。《文物》1988年第6期登载的《周原庙祭甲骨“𠄎周方伯”辨析》一文中，王先生分析了殷墟卜辞中“𠄎某某方”的实例，以为“𠄎周方伯”应指册伐周方伯的军事行动，否定了“𠄎周方伯”是把周方伯作为祭牲，或认为是册封周方伯的说法。

1988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全方先生的著作《周原与周文化》。陈先生于书中专设一节讨论西周甲骨文。书中将岐山扶风出土的有字甲骨分为卜祭、卜告、卜年、卜出入、卜田猎、地名、人名、官名、月相、杂卜十类，并考释了卜辞记载的诸方国、山川、地名、官职、动物、天文、数学、八卦等。

1989年6月，王宇信先生的甲骨学专著《甲骨学通论》问世。在50万字的著作中，有近四分之一是讨论和介绍西周甲骨文的。王先生以周原出土甲骨卜辞为基础材料，介绍了西周甲骨文的发现、研究、特征、分期，同时论证了周原出土庙祭甲骨的族属和时代。

1988年，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30华诞纪念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田昌五先生递交了《周原出土甲骨中反映的商周关系》的论文。田先生认为H11：82、84甲骨卜辞中的“𠄎周方伯”是商王册命周文王为西伯，H11：112“𠄎中”即再旗典礼，“上述三条卜辞，反映了帝辛册命文王为周方伯的全过程”；并依据“周人记商王卜辞多自左向右行，而周人记自己的事则是自右向左行”的原则，判断H11：1、3，H31：2是周人卜辞。这些卜辞与文献记载中的商周关系相符。田先生的这篇文章还发表在《文物》1989年第10期上。

1995年第2期的《华夏考古》登载了王宇信先生有关西周甲骨行款走向的第二篇论文《周原甲骨卜辞行款的再认识和邢台西周卜辞的行款走向》。作者从周原甲骨H11：6 + H11：32入手分析，纠正了过去对H31：4甲骨卜辞的行款走向自左至右的错误识读，这一点从河北邢台南小汪西周遗址出土的西周甲骨卜辞上得到了证明。最后王先生得出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争议的较为典型的西周卜辞中（无论是在周原，还是在几千里外的邢台），其刻辞行款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自右向左行。而学者间关于族属争议较大的另一类典型卜辞（即周人之物，抑或商人之物），其行款走向都与典型的西周卜辞（即含贞辞、兆辞）不同，即均为从左向右。”

1996年第3期的《考古与文物》刊登了谭步云《读王宇信先生〈周原出土商人庙祭甲骨来源刍议〉等文后的思考》一文。作者从周族贞人、字体、刻辞行款、周人祭祀商王、“𠄎”字、H11：1等四片甲骨卜辞语法文例等六个方面对王宇信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在1997年10月香港召开的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的裘锡圭先生提出“𠩺”字应读为卜兆之“兆”,周原甲骨中的“𠩺曰”应该看做占卜者据卜兆而做出判断的占辞。

1997年,台湾学者朱岐祥先生的《周原甲骨研究》一书是继王宇信、陈全方、徐锡台三位先生专著面世之后,有关周原甲骨的第四部专著。该书分为上下编,上编按甲骨出土号的次序对凤雏H11、H31两个窖藏出土的有字甲骨逐一作了考释,并有断代和语译;下编是以分论的形式对周原甲骨的时代、字形源流、卦画、字法及殷周关系等几个方面作了论证和阐述;最后附有检字笔画索引和陈全方、徐锡台二位先生描本的对照表。

1998年第3期《历史研究》上刊登了王晖先生的文章《周原甲骨属性与商周之际祭礼的变化》。文章认为周原甲骨卜辞都是周人的遗物,甲骨卜辞中的“王”与“周方伯”是一人,“‘王’是贞人所用的称谓;‘周方伯’是对所祭的殷先王而言,以过去的君臣关系来称呼”;并将甲骨卜辞与文献结合,从文武王时期行殷礼祭祀殷先王、成王时承认与殷人同一高祖,以及周人设立亳社祭祀殷人高祖、殷周通婚形成“甥舅之国”、帝辛弃祖先神祇不祀而遭文武二王征伐等角度进行了阐述。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由于周原甲骨文的出土,不仅丰富了甲骨学的内容,一改谈甲骨学必言商的局面,将甲骨学从商代扩大为商、周两代,而且增大了西周甲骨文在甲骨学中的比重,使过去零星出土的西周甲骨与周原甲骨共同构筑了西周甲骨的特点、特征。

上述回顾中,可以看到周原甲骨文的研究除了字的隶定、字义阐释、考订方国、研究商周关系等问题外,焦点集中在甲骨的族属上,或商或周,如何解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并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分歧尤为突出。

1. 王与周方伯

H11: 1、82、84、112四片甲骨中涉及祭祀成唐、大甲、文武帝乙、文武丁等商王的名号,对此学者们并无异议。H11: 1有“王其邵祭成唐”,H11: 82有“王其邵帝天□典𠩺周方伯”,H11: 84有“王其来又大甲𠩺周方伯”,H11: 112有“王翌日乙酉其来冉中□文武丁豊”等句,句中的“王”和“周方伯”是否为一人、“王”为商王或是周王等问题意见分歧较大。

主张“王”为商王的学者,依据中国古代传统的祭祀原则:“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左传》僖公三十一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认为周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周人的宗庙里祭祀商王,其甲骨卜辞必定是商人在自己的宗庙里祭祀商王的。与其观点相对立的学者主张“王”就是“周方伯”,“周方伯”就是“王”,即指周文王。这一派学者的论据是商末周初之时,周文王之父王季开始称王,文王时继其父又称王,周原甲骨正是这一段时期之内的东西,反映的是这一时期的史实。

2. “宗”的位置

H11: 1“文武帝乙宗”之“宗”,依殷墟甲骨“宗”的用例和先秦文献当释为宗庙。多数学者主张“宗”是殷商王朝倒数第二个王——商王帝辛之父帝乙的宗庙,学者们异议不大,但



对“宗”的位置分歧较大。主张周原甲骨（部分或全部）是商人之物的学者，以为“宗”的位置在殷地，周原甲骨是商人于商周之际投奔周人带来的，或是周人灭商后作为战利品带回周原的，或是其他原因由殷地带回；主张周原甲骨（部分或全部）是周人之物的学者，认为“宗”的位置在岐邑，商是周的宗主国，作为附属国的周在岐邑立“文武帝乙宗”，祭祀商王，这种例子有如南匈奴立三龙寺祭祀天神、兼祀汉帝一样。

3. “𠄎周方伯”之“𠄎”字的诠释

H11: 82、84 卜辞中有“𠄎周方伯”之句。主张周原甲骨（部分或全部）是商人之物的学者依据于省吾先生的研究成果（见《甲骨文字释林》），“𠄎”是征伐、册伐，或是与征伐有关的军事行动。“𠄎周方伯”当是征伐周方伯，卜辞反映了商周之间的敌对关系。主张周原甲骨（部分或全部）是周人之物的学者，从《说文》等文献中“册”为册告、册命之册，认为“𠄎周方伯”叙述了商王册命周文王为西伯之事，反映了商周之间相对稳定或友好的关系。

由于对上述关键词语理解的乖违，诠释的不同，对周原甲骨归属的认识自然会相距甚远。大概有下述几种观点：

1. 周原出土甲骨出自商人之手

以王玉哲先生为代表，认为 H11: 1、82、84、112 等甲骨祭祀商王，在商末周初商周两族矛盾极为严重的情况下，周文王不可能祭祀杀父仇人的祖先；中国古代祭祀传统的原则不会使周人祭祀异姓族之王；“𠄎周方伯”，就是把周方伯作为祭牲”；周原不是产龟之地。但这一派学者都遇到了一个无法逾越的困难，即周原甲骨的龟甲上成排密集而有序的方凿，与殷墟龟甲的圆凿截然不同；胛骨上平底的圆凿与殷墟弧形底的圆凿有明显的区别；龟甲整治的粗疏、胛骨不锯臼角、使用时臼部向下为正、成 90° 角的文字等现象都与殷墟甲骨截然不同，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某些辞例不见于殷墟甲骨，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的那样，前辞里的“彝”“𠄎曰”等是殷墟卜辞所不见的。在这些明显有分歧的问题上，这一派学者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2. 周原出土甲骨出自周人之手

以周原甲骨的发掘者陈全方、徐锡台和徐中舒等先生为代表，主张卜辞中的“王”就是周王，这是周人对自己领袖的称呼；周方伯即周文王；“宗”的位置在岐邑，是周人在岐邑所立的商人宗庙，祭祀商人祖先；“𠄎”的含义是册告，或是册命，“𠄎周方伯”反映了商王册命周文王为西伯的史实；最有说服力的是周原甲骨上的方凿、平底圆凿等甲骨整治方法以及辞例上与殷商甲骨有明显区别。虽说如此，但对周人为什么要在岐邑立商王庙，周人祭祀商王有悖于中国古代的祭祀传统，“𠄎”字在殷墟甲骨文多用于册伐、征伐的用例等问题上的回答也显得缺乏说服力。

3. 周原出土甲骨中庙祭甲骨卜辞出于商人之手，记事刻辞出自周人之手

以李学勤、王宇信先生为代表，将周原甲骨分为庙祭甲骨卜辞和记事刻辞两种。庙祭甲骨卜辞为殷人所为，但出自周族入朝商王室的卜官之手，因此占卜时仍须遵用殷制，又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周族占卜的某些作风，族属上仍主张是周人甲骨。李先生还指出了西周



甲骨与殷商甲骨的多处区别，认为H11：1、82、84、112等几片卜辞是周人卜官参加册命周文王为西伯之礼所记，后带回岐邑的。这是一个较为折中的观点，一方面对H11：1、82、84、112四片甲骨卜辞中祭祀商王的内容作了合理的说明，同时也阐释了甲骨的整治上表现出周人所特有的钻凿特点与方法。但在论证的时候，也暴露出论据的不足，如认为殷王朝的卜官来自许多方国，其中包括周，并论证周原甲骨的一部分是商中央王朝之物，但出于周人的卜官之手，所以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周族占卜的某些作风，如方凿、辞例等等。虽说如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有殷商甲骨和周特点的甲骨，并未发现其他方国的甲骨。如果说商王朝的卜官都来自各个方国，每个方国的卜官都像周卜官一样用自己方国的方法治理甲骨和记述卜辞，为什么其他方国的甲骨与殷人相同，没有自己的特点，唯独周人例外呢？

目前，争论仍在继续，研究也在进行，周原甲骨的出土与研究，将为搞清商末周初这段历史增砖加瓦，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但我们也发现在研究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

1. 研究周原甲骨主要是围绕着对甲骨文字的诠释、字义的考证、甲骨的断代、甲骨的族属等方面进行，这无疑是必要的，但学者于研究时多囿于甲骨文字本身的研究，周原甲骨、西周甲骨、周原甲骨与殷商甲骨的比较等等，而H11、H31灰坑里出土的50余件玉石雕饰、752件角质器、472枚蚌壳，以及陶片都是有助于断代的最佳材料，却被搁置于一边。

2. H11、H31出土于凤雏西周甲组建筑遗址西厢房2号房基址中，建筑本身的性质目前还有争论，建筑的上下限年代尚未确定，西厢房的性质也有待于研究。这些无疑影响到周原甲骨的研究。

3. 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文王迁丰之后，一直到平王东迁，周原仍是西周的重地，居住着西周王朝显赫的达官贵族，并留下了大量的西周铜器，结合铜器来论证周原甲骨无疑是一种较好的方法，但至今未见到这方面的文章。周原在西周时期的性质有待于深入研究，这对周原甲骨族属的研究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二、整理方法

周原甲骨的出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课题。课题的解决，一方面有赖于深入的研究，但首先要保证被研究材料的可靠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取得了引人注目成绩的众多学者当中，尤以陈全方、徐锡台、李学勤、王宇信等位先生最为显著。陈先生和徐先生作为发掘者在发表资料、分类、历法，以及与考古结合等方面着力较多；李学勤、王宇信二位先生从西周甲骨的角度，以及与殷商甲骨比较方面阐释最多；此外，徐中舒、王玉哲、高明、田昌五、缪文远、顾铁符、萧良琼、台湾学者朱岐祥以及美国学者夏含夷等许多知名学者都加入了研究讨论的行列。在研究过程中，学者首先感到的是在以往发表的资料中，周原甲骨文因字小如粟米，没有也不可能像殷墟甲骨那样的拓本发表；照片受当时技术的限制，模糊



不清，加之陈、徐二位先生公布的摹本在一些关键字上相互抵牾，给学者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运作之时，“周原甲骨整理”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伐纣课题组”下的一个子课题。

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之一的“周原甲骨整理”，其目的是真实、准确地将周原甲骨公布于世。于整理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如下方法：

1. 重新对周原出土的每一片甲骨进行照相，以弥补无法拓印的不足；同时将 H11、H31 两灰坑出土的石、陶、蚌等质的器物也进行了照相，公布出来；同时将主要甲骨的背面照片附在正面照片的下角供学者研究时参考。

2. 用 20 倍显微镜观察每片甲骨上的每一个字，辨别字的笔画与笔锋；根据有无刻锋和笔画形状的差别，来判断是否为字，并区分字和刻划符号的不同。凡是字者，字的笔画必然有其刻锋。在放大镜下，观察笔画，其刻锋分二种：凡刻锋呈“√”形，即左短右长者，我们称之为右锋；凡刻锋呈“∨”形，即左右相同者，我们称其为中锋。极其个别笔画也有为左锋者。此外，还有一种其剖面呈“○”状，因任何工具都刻不出其形状，这种痕迹往往是非人工行为所致，我们称其为非刻划甲骨。刻锋明显但不为字者，我们称其为非字甲骨。在整理过程中对非刻划甲骨和非字甲骨我们都予以保留，供研究者参考。其结果如下：

(1) 非刻划甲骨

H11: 62、79、140、143、146、148、150、156、165、180、182、184、
185、191、192、201、203、204、206、207、208、211、212、215、
218、219、220、221、223、224、225、227、228、231、233、234、
235、238、239、240、247、250、253、254、255、258、260、262、
263、265、266、267、271、272、274、283

H31: 7、10

共 58 片。这些不是刻划留下痕迹的甲骨用“非刻划”来表示，即表示不是当时人的行为所为。

(2) 非字甲骨

H11: 149、166、173、190、194、197、199、214、216、217、236、
249、251、275

H31: 8、9

共 16 片。这些甲骨刻锋明显，但又不是字，可以判定有些为界栏，有些为符号。

(3) 其余为有字甲骨

3. 根据照片，写出释文，仅供研究者参考。扶风县出土的有字甲骨，字的位置图是依照周原扶风文管所、周原考古队绘制的《周原甲骨》为蓝本进行描绘，对该书隶定错误的地方如 3 号甲骨、4 号甲骨、5 号甲骨作了修正。

4. 将陈全方、徐锡台、王宇信、朱歧祥四位先生研究著作中的著录、释文列成《周原甲骨文摹本著录对照表》和《周原甲骨文释文对照表》，便于研究者对照查询。四位先生的著作